

我从事文学翻译已经40年有余。40多年来虽然不无艰辛,但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顺风顺水,一路前行。春秋迭易,岁月轮回,从2012年到2022年,是我步入文学翻译道路的黄金十年。

我以翻译介绍澳大利亚文学为主业,十年间,出版了《卡彭塔利亚湾》(Capentaria)等16本澳大利亚文学、文化著作。2018年,为纪念我从事文学翻译40年,青岛出版社出版了《李尧译文集》,收入我40年间翻译的最重要的十部澳大利亚文学作品。2013年,《卡彭塔利亚湾》获澳大利亚澳中理事翻译奖,2016年,《煤河》(Coal Creek,亚历克斯·米勒著)获北京大学“胡社麟杰出翻译奖”。2018年,澳大利亚在华研究基金会(FASIC)授予我“终身成就奖”。2014年和2019年,悉尼大学和西悉尼大学分别授予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2022年6月,墨尔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澳大利亚著名历史学家大卫·沃克教授合著的英文版Happy Together, Bridging the Australia-China Divide(《一起快乐,在澳中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本书记述了我和大卫·沃克教授两个同龄人的友谊,我们经历的故事,以及对中澳关系的展望。在中澳关系面临挑战的当下,这本书的出版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1972年中澳建交后,澳大利亚第一任驻华大使、至今仍任为中澳友好奔走呼号的斯蒂芬·菲茨杰拉德(Stephen FitzGerald)先生说:“这本书的巧妙之处在于,李尧的故事与他的同行、著名历史学家、作家大卫·沃克的故事相互交织,使得他们的关系成为中国和澳大利亚在写作、翻译、出版和历史研究领域相互合作的催化剂。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它显示,在澳大利亚政客充满敌意和令人不快的言论甚嚣尘上的当下,人类充满创造力的友好关系仍将继续下去。”2014年9月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的考林·马克林(Colin Mackerras)教授撰文说:“Happy Together是一本感人至深的书,也是一本学术著作。因为它的作者都担任高级学术职务,并有令人钦佩的学术贡献记录。这本书的学术性还在于它对历史和当代世界细节的关注。它依赖于两位作者对自己过去的反思,对他们祖先历史的挖掘,以及对与他们一路走来的其他人的回忆,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于我而言,这本书的出版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

除此而外,十年间,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我翻译的美国著名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长篇小说《中年》,玛丽莲·罗宾逊的《基列家书》(莱拉),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我翻译的英国著名作家马汀·艾米斯的长篇小说《雷切尔文件》和《死要》。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三年间,我没有丝毫懈怠,“足不出户”,潜心翻译,化天灾为机会,到目前为止,翻译完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里克·怀特的重要著作《特莱庇的爱情》(The Twyborn Affair)、澳大利亚著名作家托马斯·肯尼利的长篇小说《狄更斯的孩子》(The Dickens Boy)、米兰迪·里沃的长篇小说《石天金山》(Stone Sky Golden Mountain)、玛丽·冈特的《1913中国华北见闻》(A Woman in China)、塔拉·琼·文奇长篇小说《屈膝》(The Yield),英国作家霍勒斯·格里斯利的长篇小说《鸟儿还在地狱里歌唱吗》(Do the Birds still Sing in Hell)。总字数达130万。

在我从事文学翻译的道路上,2012年还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因为从这一年起,我开始系统地研究、翻译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学、文化和历史。不算短的“澳研”经历让我认识到,对我国普通读者而言,澳大利亚是一个不到250年历史的 Lucky Country(幸运的国家),这里的人们过着充满田园风情的幸福生活。但大多数人有所不知的是,澳大利亚是一块古老的土地,早在六万年前,这里的人们就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创造了人类文明。鼎盛时期,共有500多个部落,70万人生活在这块土地。他们有250个已定义的语言组,有内容丰富的口头文学代代相传。然而创造这种文明的澳大利亚原住民,打从1770年6月库克船长第一次闯入他们的家园,1788年大英帝国开始在这块土地上殖民,便开始了被压迫、被灭绝、被奴役的悲惨历史。作为一个译介澳大利亚文学的翻译工作者,我深深地感觉到,只把目光放在描绘殖民地白人社会“繁华盛景的主流文学”,忽视原住民文学与文化的传承,不去触碰那一段骇人听闻的历史,是极大的遗憾。特别是面对西方世界歪曲历史,疯狂攻击中国“人权纪录”的滔天滔浪,作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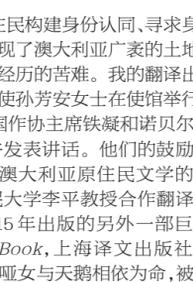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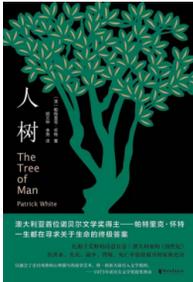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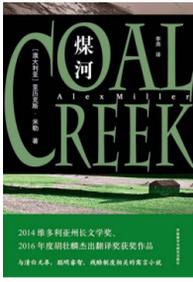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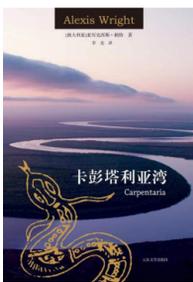
文学翻译的黄金十年

□李尧

个有良知的文学工作者,理所当然,应该拿起武器而战斗,而我唯一的武器就是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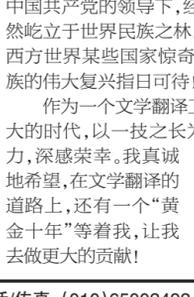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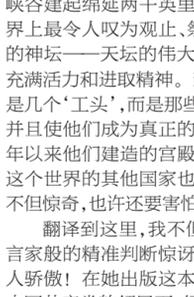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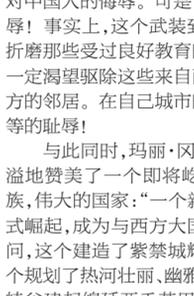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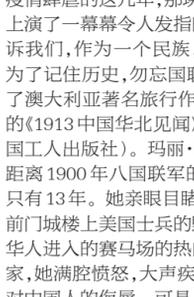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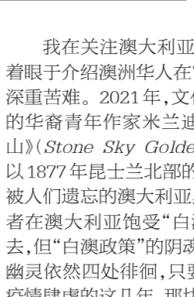
201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我翻译的澳大利亚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原住民作家亚历克斯·赖特(Alexis Wright)的长篇小说《卡彭塔利亚湾》(Capentaria)。亚历克斯·赖特的曾外祖父是广东人,她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卡彭塔利亚湾》被誉为民族史诗,获得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这部小说在探索原住民构建身份认同、寻求身份归宿的同时,向读者展现了澳大利亚广袤的土地上,原住民在殖民统治下经历的苦难。我的翻译出版之后,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孙芳女士在使馆举行隆重的新书发布会。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出席,并发表讲话。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更加坚定了我翻译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学的信心。随后,我和中国人民大学李平教授合作翻译了亚历克斯·赖特于2015年出版的另外一部巨著《天鹅书》(The Swan Book,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哑女与天鹅相依为命,被称为“天鹅女”。“天鹅女”具有象征意义。作为一个无辜的弱小者,她遭受暴力之后不再说话,也渐渐失去说话的功能。这与澳大利亚原住民几百年来遭遇如出一辙。作者之所以选取哑女作为原住民的象征,是因为她认为,在种族主义依然猖獗的当下,他们根本无法发声。《地平线上的奥德赛》(Odyssey of the Horizon)是亚历克斯·赖特的最新力作。这本书是寓言,是散文,也是诗。该书描绘了1788年,英国“幽灵船”穿越地平线入侵悉尼湾的那一刻;描绘了“暴力殖民创伤性的记忆”。2021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将英文原著、日文翻译(日本著名翻译家有满保江译)和我的中文翻译三种语言的文本集结出版,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使得一代青年学子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对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苦难有了更多的了解。

众所周知,“被偷走的一代”是澳大利亚历史上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群人,是20世纪初澳大利亚政府推行“白澳政策”的牺牲品。从1910到1970年,全澳大利亚有近十万名土著儿童被政府从家人身边强行带走。“被偷走的一代”,一度成为澳大利亚原住民



文学最重要的主题。2008年2月13日,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代表澳洲政府向“被偷走的一代”正式道歉。2012年,我翻译出版了威拉德朱里族青年作家安尼塔·海斯(Anita Heiss)的《我的澳洲故事,我是谁?》(My Australian Story, Who am I?)。陆克文为我翻译的这本书写了序言:“安尼塔·海斯撰写的《我的澳洲故事,我是谁?》为中国人民打开一扇新的窗口,让他们看到70多年前,澳大利亚原住民和非原住民之间感紧张的关系。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原住民女孩5岁时和家人分离,后来悉尼一个非原住民家庭生活的故事。通过这部小说,读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生活以及‘被偷走的一代’经历的痛苦、忧伤和巨大损失。李尧教授翻译的《我的澳洲故事,我是谁?》捕捉到了这个独特的澳大利亚故事的精髓……李尧教授通过他的翻译向中国读者准确地反映出澳大利亚文化和文化史的多样性。我非常荣幸地借次机会感谢他的工作和奉献。”陆克文对于翻译与“被偷走的一代”有关的文学作品的积极态度从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到翻译介绍澳大利亚原住民作品的重要性。

然而,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文学作品,绝不仅仅局限于“被偷走的一代”的苦难。近年来,一代年轻的原住民作家以犀利的笔触,描绘了澳大利亚原住民当代社会的生活,以及原住民文化与传统激烈的碰撞,无情地鞭挞了殖民主义统治,为原住民争取权利呐喊,其主题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得以深刻表达。2020年7月16日,出生于1983年的原住民青年作家塔拉·琼·文奇(Tara June Winch)凭借其201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屈膝》(The Yield)获得迈尔斯·富兰克林奖。《屈膝》聚焦于威拉德朱里族裔温蒂家族,通过三个人物:奥古斯特,她的祖父艾伯特·冈迪温蒂,以及19世纪的传教士格林利夫的故事,在交替的章节中折射出文奇对澳大利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考。在虚构的莫伦比河,象征整个澳大利亚的大屠杀平原方圆500英亩土地上演绎出几代人被“白澳政策”和种族主义压榨的历史。《屈膝》的创作、出版、获奖,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我及时把此书翻译成中文,将于2022年10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我在关注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学的同时,还特别着眼于介绍澳洲华人在“白澳政策”的铁路下经历的深重苦难。2021年,文化发展出版社出版了我翻译的华裔青年作家米兰迪·里沃的长篇小说《石天金山》(Stone Sky Golden Mountain)。《石天金山》以1877年昆士兰北部的“淘金热”为背景,揭开渐渐被人们遗忘的澳大利亚黑暗历史的一页。华人淘金者在澳大利亚饱受“白澳政策”压迫的历史已成过去,但“白澳政策”的阴魂并未完全消散,种族主义的幽灵依然四处徘徊,只要气候合适,就会兴风作浪。疫情肆虐的这几年,那块浸透了华人血泪的土地,更上演一幕幕令人发指的反华闹剧。历史与现实告诉人们,作为一个民族,只有强大,才能不受欺凌。为了记住历史,勿忘国耻,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翻译了澳大利亚著名旅行作家玛丽·冈特100多年前写的《1913中国华北见闻》(A Woman in China,中国工人出版社)。玛丽·冈特1913年1月到北京,距离1900年八国联军的铁蹄践踏这块美丽的土地只有13年。她亲眼目睹了北京使馆区洋人的骄横,前门城楼上美国士兵的野蛮,六国饭店的奢华,不许华人进入的赛马场的热闹。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作家,她满腔愤怒,大声疾呼:“我本来想说,这几乎是对中国人的侮辱。可是,现在我要说,这就是一种侮辱!事实上,这个武装到牙齿的使馆区一定是残酷折磨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的心头之痛。他们一定渴望驱除这些来自西方的狂傲的洋人和来自东方的邻居。在自己城市的中心被外国人辖制那是何等耻辱!”

与此同时,玛丽·冈特以诗一样的语言,热情洋溢地赞美了一个即将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一个新的国家会不会按自己的方式崛起,成为与西方大国比肩而立的强国?毫无疑问,这个建造了紫禁城辉煌的殿堂、美丽的庭院,这个规划了热河壮丽、幽雅的避暑山庄,这个在高山和峡谷建起绵延两千英里雄伟的长城,这个构想出世界上最令人叹为观止、祭奠任何一位神都绰绰有余的神坛——天坛的伟大民族依然像几千年前一样,充满活力和进取精神。当这种精神鼓舞推动的不仅是几个‘工头’,而是那些被奴役的辛勤劳动的人们,并且使他们成为真正的主人,这个国家就会像几百年以来他们建造的宫殿与祭坛那样辉煌。那时候,这个世界的其他国家也许只能站在一边冷眼旁观,不但惊奇,也许还要害怕。”

翻译到这里,我不但为玛丽·冈特高瞻远瞩、预言家般的精准判断惊讶,而且为身为新时代的中国人骄傲!在她出版这本书的百年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已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的崛起已经使得西方世界某些国家惊奇之余,更感到害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作为一个文学翻译工作者,我为自己能在伟大的时代,以一技之长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尽绵薄之力,深感荣幸。我真诚地希望,在文学翻译的道路上,还有一个“黄金十年”等着我,让我去做更大的贡献!

十年译事 如鱼得水

□黄荭

在持续高温一个多月后,南京终于在“处暑”这天夜里下了一场雨。第二天清晨打开露台的落地窗,暑气终于退了不止一丈远,温度降下来,湿漉漉的空气中弥散着香樟、柠檬、迷迭香、白岩岩和枯叶混合的淡淡味道。我是2010年秋开始装修南大和园房子的,因为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公寓,所以只要和预算出入不大,都尽量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子来。贴瓷砖的时候特意请泥瓦匠在露台翻了一个花坛和一个小水池,装修期间就哼哼唧唧一趟趟搬土上楼,开始打造我的空中花园。等到一年后入住时,柠檬、迷迭香、女贞、香樟、桂花、爬山虎、睡莲、紫茉莉,各种颜色的百日菊和月季已经栽下,仿佛一个会开花会迎风飞舞的小小心愿,晨昏,四季,周而复始。

每天看着,感觉花草长得很慢很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十年过去,原先及膝的柠檬长到两米多高,一树沉甸甸的果实垂下来,压弯了枝条。而十年,也是“园丁”在大学培养博士的周期:四年本科+三年硕士+三年博士(如果能按时顺利毕业的话),从一个字母一个单词一个对话到一篇书评一篇论文一个值得研究的选题,这个“苦读”的过程像极了师生共同浇灌一棵智慧的苗芽,守护它长大,直到瓜熟蒂落的一天。如果知识是鱼,导师要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激发学生自主学习 and 开展独立研究的能力。而在培养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导师自己也在接受挑战,不断进取、突破和沉淀。

和看花草一样,如果看我每天的日常,会有一种一成不变的错觉,十年如一日,甚至二十年如一日,无非就是在阳台上种种花,在厨房做饭,在露台里读书、教书、译书、写书……

我不是那个爱做总结的人,总觉得生活最好的状态是“自然而然,安之若素”。2009年出版第一本随笔集《经过》时我比较兴奋比较澎湃,花了几天时间认认真真写过一个序,仿佛只有这样才不辜负流年飞光:“我原以为这十多年来,自己只是一味忙着翻译,看书,吞食别人的文字,殊不知,这深深浅浅的阅读同时也在雕刻我,改变我:独自经过一片书林,那条小小的、毛茸茸的书虫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蜕变为一只寂寞飞舞的夜蛾,被月白色的灯光迷住,义无反顾。”我把阅读比作呼吸,把翻译比作如鱼饮水,我饮了别人的文字,于是那文字也便有了我的温度。我还把自己形容成“那只有着红色触须的寄居蟹,栖身在不同作者的语言外壳里,用别人的故事伪装自己。我在沙滩上留下仓促的足印,在潮水涨落过后就全然不见了痕迹”。如果偷懒,这样的总结复制粘贴过来放在今天,马马虎虎也说得过去。曾经有一个诗人朋友调侃说,《经过》这个书名你可以一劳永逸地用下去,之后的书就叫《又经过》《再经过》《还经过》。而我后来出版的几本随笔集的书名似乎都有点“一劳永逸”的嫌疑,《闲来翻书》(2010)之后可以《又翻书》《再翻书》《还翻书》,《转身,相遇》(2013)之后也可以《又相遇》《再相遇》,《一种文学生活》(2018)之后还是《同一种文学生活》……日复月,月月复年年,读书、翻书、写书已然成了我固定的一种生活方式,就像西西弗每天推巨石上山。

一晃十年,但仔细想想,变化还是有的。以前做翻译,基本上都是出版社拿了书找过来,但现在译者看到好书也可以写一个选题报告推荐给出版社,出版社选题通过买了版权之后再委托给译者翻译。龚苏萝·德·圣埃克絮佩里的《玫瑰的回忆》是我成功推荐的第一个选题,2002年我的译本在译文出版社出版,2015年海天出版社再版。之后我又顺利推荐出版了菲利普·福雷斯特斯的《然而》(2008,2013年再版)《薛定谔之猫》(2014)《一种幸福的宿命》(2021),塞居尔伯爵夫人的《苏菲的烦恼》(2016)《小淑女》(2017)《苏菲的假期》(2020)《新童话》(2020),安托瓦内特·福克的《两性》(2019)和《孕育》(还在苦译中)……自己做选题的好处是可以聚焦自己关注的社会和文化现象,更好地把翻译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相互促进,还可以把自己的经验感悟有机地融入到教学实践中去。十几年来,我指导的硕博生在读期间基本上每人都有译著出版,其中不乏和论文选题密切相关的作品,有的同学甚至已经开垦出一小块生机勃勃的学术“自留地”。各种线上线下的读书分享会、翻译工作坊、中外学术讲座、研讨会和论坛让师生极大地拓宽了视野,亲历学术交流和对话的现场,有时不仅作为听众,还要作为参与者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

虽然我没有翻译中国文学,但对致力于译介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法国译者、学者和出版人相对比较熟悉,时不时地会给他们介绍一些我认识的中国作家或令我印象深刻的文学作品。毕竟在世界文学之都南京生活了近30年,我认识不少南京本地的作家和诗人(当然也有外地的),在先鋒书店、奇点书集、可一书店时不时的也会应邀参加一些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分享会或中法(外)作家交流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十年让我对“世界-文学”有了更深的认识:文学让我们走向世界,也让我们回归自身。在国家提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口号之后,紧随而来的是“中国学术走出去”。国家社科基金从2010年开始设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主要立足于学术层面,资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以外文形式在国际权威出版机构出版,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以增进国外对当代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推动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提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2019年我和商务印书馆联合申报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整个项目进展得行云流水。法国译者马露一听说合作翻译的邀约就满口答应,说他之前就读过《乡土中国》,非常喜欢,这本书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中国乡土社会结构及其本色,语言活泼,很值得译介到法国。当时他在阅读过程中就做了一些笔记,并暗自琢磨术语和关键词应该怎么翻译才忠实妥帖。很快我们的法译本出炉,顺利通过法国专家的双盲审,得到很高的评价,著名汉学家和人类学家雪梅为法国读者写了序,介绍费老的学术背景和他提出的几个重要概念,法文版《乡土中国》于2021年7月由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出版社出版,很快登陆法国各大书店和网站。今年6月,我收到出版社社长的邮件,说在OpenEdition(法国人文社科领域权威的电子出版物综合性网站)上推出了这本书的电子书。两年来我也主持或参加了多个外译项目的答辩会,其中就有我指导过的博士王明睿申报的《何以良渚》和曹冬雪申报的《老兹中国》。

最后想说的一点变化是,今年夏初,为了参加几个好朋友攒的一个“亦诗亦画”的展览,我重新拿起画笔画了几幅水粉画,其中一幅画的是露台的绣球,配了一圈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罗贝尔·德斯诺斯(Robert Desnos,1900-1945)写给小朋友的一首红绣球蓝绣球的诗。这位二战期间参加过抵抗运动、后来病死在纳粹集中营的诗人说过两句令我难忘的诗,一句是:“应该自由的不是诗歌,而是诗人。”另一句是:“作为人类一员,面临的挑战不仅是保持自我,而且是众生皆我。”我希望自己可以像他那样写诗,在下一个十年。

